

## 传承·反思·超越： 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20)04-0021-19

### 开幕式

杜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妇女研究论丛》执行主编):1995年的金秋,中国作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不仅出色地承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了《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出台,而且利用筹备和召开大会的契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作为北京世妇会2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我们举办这次线上研讨会,对性别社会学进行回顾和展望。传承、反思和超越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传承就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球妇女峰会讲话精神,继承北京世妇会的精神,传承老一代学人关注现实妇女问题以及推动妇女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 and 责任意识,既向内看,从社会性别视角切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反思就是把性别社会学置于新的时代、新的高度去反思、去总结。超越就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拓展妇女/性别研究的新视野、新空间、新路径,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今天我特别期待各位专家学者能围绕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发表真知灼见,这既是对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南,继往开来、推动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发展的最好行动。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95世妇会以来,中国性别社会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在关注的过程中挖掘资料和创新概念,不断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研究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如果说,十几年前性别社会学以翻译和理论借鉴为主,而当前研究更多地专注于中国问题并有意识地总结中国经验。当前,性别社会学研究整合了有关家庭的、性的、劳动的、人类生产活动和再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每个领域的社会学知识也都需要加入性别视角。本次会议,既有致力于推动性别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老一代学人,也有活跃在性别社会学领域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老中青三代的对话和讨论,反映了'95世妇会以来妇女/性别研究的代际传承和变化。25年前上大学的大学生,今年也是40来岁的人了,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积极参与、反思和写作,不断把对性别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展示出来,推动着中国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我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 第一阶段

钱岳(《女性教育崛起背景下的性别关系动态》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教育上赶超男性的新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学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女性的崛起”(the rise of women)<sup>[1]</sup>。中国也不例外。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招生和毕业人数

大规模增长。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已经与男性基本持平甚至超过男性<sup>[2]PP54-80</sup>。比如,1971-1973年的出生队列中,12%的男性和7%的女性就读高等院校,但在1983-1985年的出生队列中,21%的男性和23%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sup>[2]PP54-80</sup>。有学者预测,女性在教育上的优势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sup>[3]PP259-289 [4]P615</sup>。教育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并逆转,挑战了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对家庭生活和性别关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sup>[4]P615 [5]PP318-336 [6]PP341-360</sup>。

在美国,教育性别差异的转变也伴随着婚配模式的转变。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可能结婚,而且女性嫁给比自己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sup>[5]PP318-336 [7]PP403-419</sup>。但是,在中国,高学历可能仅仅与男性的婚姻推迟相关。对于女性而言,高学历更可能与终身不婚的高可能性呈正相关;同时,传统的“男高女低”的教育匹配模式仍然比“女高男低”更为常见<sup>[8]PP61-74</sup>。这样的婚配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和模式在中国家庭中仍然根深蒂固<sup>[8]PP61-74 [9]PP19-52</sup>。同时,中国家庭非常重视孩子的培育,而且通常主要由女性承担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重任<sup>[10]PP79-90</sup>。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经济独立的女性可能认为她们无法从婚姻中受益,因为婚姻生活往往与她们的事业相冲突。高学历女性在寻找配偶时,可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相反,很多男性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性别意识仍然较为传统,他们可能更偏向选择受教育程度比他们低、以家庭为重的女性为配偶<sup>[8]PP61-74</sup>。

虽然由于性别比失调,中国适婚年龄的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数量<sup>[11]PP77-100</sup>,但是中国城市地区高学历女性的“婚姻挤压”问题并不是因为缺少男性,而是缺少能够与高学历女性分享相似性别意识的男性。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我和合作者发现,在“50后”中,男性和女性对于家庭领域性别分工的看法(即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种安排的认同度)很接近,但在更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性别差距逐渐加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传统的家庭分工持反对态度,这种性别差距在高

学历的“90后”当中尤其惊人<sup>[9]PP19-52</sup>。这是因为,在年轻的队列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逐渐赶超男性,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可能表达对性别平等的支持,但是教育对男性性别态度的改变作用却相当有限。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男性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持续抗拒,可能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女性无法找到“三观一致”的异性作为潜在配偶,她们或许将推迟结婚或选择不婚,而晚婚及不婚可能进一步拉低生育率<sup>[12]PP453-478</sup>。在已婚群体中,如果夫妻之间对性别平等和家庭分工的认知有较大差异,他们也更容易有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发生较多的生活摩擦,从而出现较高的离婚几率<sup>[13]PP1015-1028 [14]PP954-967 [15]PP383-400</sup>。

有学者曾提出,女性在公共领域赶超男性,只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前半部分,而男性平等地参与家庭生活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后半部分<sup>[16]PP207-239</sup>。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社会政策总是动员女性(比如,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则鼓励女性就业;而失业率高的时候,则鼓动“女性回家”),但对于男性的角色却鲜有讨论和改变<sup>[17]PP579-606 [18]PP613-634 [19]PP471-492 [20]PP163-176</sup>。如果家庭领域改变缓慢,那么私领域的滞后终将阻碍公领域性别平等的实现。因此,探索如何调动男性参与家庭的积极性以及如何改变渗透在家庭和职场中的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对中国实现性别平等的进程有深远意义。

计迎春(《马赛克家庭主义下的代际—性别关系再制度化:本土化家庭理论探索》,上海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今天的演讲是以本人2020年8月份即将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章《马赛克家庭主义:从女儿养老看中国家庭制度变迁》为例,回顾我在性别、家庭研究领域的本土化理论探索之路。马赛克家庭主义中的马赛克是指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呈现传统、现代杂糅的马赛克模式,而家庭制度的变迁正是中国转型社会传统、现代杂糅的复杂现代性的一个缩影。

与传统儒家父系家庭不同,马赛克家庭模式是一个现代双系家庭。和现代独立的核心家庭不同,它是镶嵌在传统代际关系里的多核家庭体系。与传统父权等级家庭强调单向向上的孝顺服从或者有些学者强调的现代家庭以(孙)子女为中心的单向下

行的关系不同,其代际关系是双向的,且与传统父权家庭相比,更为平等、亲密,代际之间互相依赖、共生。这里形成了一个家庭内循环的安全网络——以事实上的私人福利家庭体系(代际福利)来补充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薄弱的社会福利体系。

我的研究中所有的女性均沿着双系方向遵循传统孝顺规范进行养老实践,这和传统父权家庭中已婚女性跟随丈夫照顾公婆而不为自己的父母养老的传统规范和实践迥然不同。这种双系实践的出现以及形成中的双系规范,是对传统父权家庭制度的一个革命性冲击。

而在现代社会,离婚率快速上升。现代婚姻的脆弱性本身就是对父权体系的削弱,同时也提升了女性和父母代际关系的重要性。亲密关系的维度和界线渐渐修正了传统父权、父系规范。从已婚女性的角度出发,父母是夫妻情感的“底线”,而公婆则是可能会消失的“附带品”。父系和母系的地位呈现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从传统的父系一支独大到现代的父母系双系并重。

养老和育儿还在女性之间形成了一个代际循环。也就是说,对公婆的养老要依赖于媳妇是否孝顺、懂事,而媳妇是否懂事,也和公婆是否讲理、是否帮助媳妇育儿有关,父系权威已经显著下降。不过,养儿防老、孝敬公婆的传统父权家庭规范的底线还在一定程度上被遵守着。但是,如何养老、质量怎么样、是否尽心,已经是一个可以商讨的现实问题。

母亲也开始参与女儿孩子的养育,为女儿提供了婆婆以外的育儿支持,使得婆婆不再是单一的照料提供方,女儿也有了选择的余地,娘家的地位开始提高,而婆家的地位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境下,祖辈的育儿照料既是责任也是权利,更是权力和对未来养老的潜在投资。不同代际和双系的女性在养老和育儿照料中分工协作,完成社会再生产最重要的环节和循环。在这个动摇父权家庭传统的连锁反应链条中,如果公婆没有参与媳妇的育儿实践,就可能对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养老和育儿照料的代际循环和双系拓展,既削弱了传统父权家庭规范,又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和照料的女性化,形成了传统—现代杂糅、代际亲

密共生、双系多核的马赛克家庭模式。

马赛克家庭主义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两个版本的发展。在前马赛克家庭主义阶段,我在2015年提出了传统—现代杂糅框架。在马赛克家庭主义1.0版本阶段,我在2017年提出了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个术语,在传统—现代杂糅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亲密共生。在马赛克家庭主义2.0阶段,我在传统—现代杂糅和代际亲密共生的基础上又描述了双系多核家庭体系的产生。那么这个理论的内核就是传统—现代杂糅的家庭关系和复杂现代性。

下面谈谈我关于发展本土化性别、家庭理论的体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扎根中国情境。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国概念、中国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源于中国土壤的有源之水的升华就是本土概念。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有本之木长出来的就是本土理论之花,结出来的就是本土理论之果。和那种直接使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案例的研究不同,用本土理论来照亮中国故事,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生活的质感背后是结构的强大和文化的坚韧,而理论就是照进现实世界的光芒。那么中国理论和中国的故事应该有自己的张力,它不是孤例也不是特例,它应该是可以旅行也可以移植的。它对理解转型社会、东亚社会都应该有所启发,甚至对于解释西方社会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二是和国际主流理论对话。本土理论要有生命力,必须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之上。那么这个理论和以下理论及其背后的学者都需要对话:现代性、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反思、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亲密关系和现代性、代际关系和照料、东亚学者关于现代性和家庭的思考。

三是参与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本土化理论既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自说自话。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作品出来之后还要接受同行评价,进入学术共同体的讨论、批评、引申和演绎的过程。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国内外顶级的学术会议上陈述这个理论,在国内外的高校做学术报告,都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文章发表以后,其影响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理论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其影响可以是多方面的。首先,理论的光芒可以去照亮人们思维

的盲点,去照亮世界隐秘的角落,帮助人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这就上升到话语体系的高度了。其次,这个理论可以用来指导不同的定量、定性的实证研究,发展假设,探寻现实世界的生活逻辑。再次,它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国家庭、性别方面的研究,成为很多文献综述经常引用的对象。最后,它可以改变政策制定者,改变普通人对于当代中国家庭的认识,从而为改变这个世界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 第二阶段

黄盈盈《多重张力下的性/别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我今天主要是粗线条地勾勒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与性及多元性别相关的研究概貌,偏重从(跨)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角度谈一点初步的观察与思考。

与性及多元性别有关的概念使用,本身就是我们从2005年左右就开始讨论的重要问题。暂且借用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等台湾学者在1995年创造的“性/别”概念。斜线画出了性别本身的多元流动及其间的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之间不同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别”则道出了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也表达了性与其他社会差异(阶级、年龄、种族等)的复杂关联。我对于性与性别关系的认识与立场也得益于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性—性别”论述以及英语世界sexuality研究脉络的发展。

讨论基础来自文献回顾(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著作、会议论文和重要的内部报告及媒体评述,且尚在进行之中),我的研究、教学与观察,以及学生时代起跟着潘绥铭老师策划会议及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开展“促进中国性研究”各类活动的切身体会。我关心以及借以检视的问题是:谁在什么背景之下用何种方法研究了哪些议题?对话于谁?增进了哪些认识?激发了何种思考?有什么局限?方向何在?

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研究承接的是20世纪60-70年代性的高度政治化与去性文化。从“文革”走来的人们对于性知识的渴求加上一系

列新词汇的翻译与创造,促使80-9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由性医学与性的科学知识所带动的“性学热”(20世纪初可谓第一次性学热)。80-90年代中后期是研究的开创期,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代。除了对于中国性现象不乏洞见的社会调查、法律争议、性教育实践、围绕婚姻与爱情的讨论等,对传统性文化的介绍也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重点(如娼妓史、敦煌性文化、阴阳哲学、房中术、同性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性/别研究遭遇了“艾滋病”在资金的带动下迅速与国际接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再度科学化与医学化。随后,经由交叉的LG-BTQ、(新)女权、青少年性教育与国际环境有了更具进步意义的联动。国内外政治张力、互联网时代情色的彰显与同时间扫黄净网与反性力量的加剧,也使得近十年来政治、经济、学术、NGO以及社会大众等不同立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且充满张力。

在此脉络之下,性/别研究所凸显的张力是多重的,涉及学术与研究者的性/别认同、生活经验、社会位置与知识背景的复杂关系以及代际更替带来的挑战;学术研究与审查制度、商业化之间的拉锯;学界的自说自话与运动倡导可能带来的对研究独立性的挑战;议题的跨学科特点与不同主体间对话的困难,以及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哲学、艺术领域的突起之际,社会学与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极度缺乏;对于主流人群性/别边缘议题的关注不足,对于性/别边缘人群日常生活及其所透射的主流问题亦缺乏流变的分析。此外,“传统中国—西方社会—现代中国”这一偏想当然化的简化框架依然限制着我们更为丰富的性/别想象,对西方学术体系的拥抱与“本土”的僵化理解并存于性/别(以及其他研究)领域。而性的猎奇与高度道德性特点,也对研究方法与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陆的性/别议题,在当下正以更加(多重)政治化、更加聚焦却也更为窄化的面貌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我们依然未进入历史文化的宝藏,可是离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广袤的地面却渐行渐远,对不同人群生活世界的好奇、耐心与切身的行动力也正在逐步消失。

张力与困境也意味着联系与可能。性/别相关的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的道路上,首先需要鼓励结

合“个案经验—社会情境—对话语境”的扎实研究，而努力也可以从提问开始：扎根于中国历史、民间社会、生活百态中的性/别(情/色)是一些怎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回应哪些问题？一个更具普遍的问题可能是：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我们如何接地气地思考中国经验、提出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共情力、对现实的感知力与思考力？如何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当下、理解人、理解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理解自身？为回应这些问题，一种积极的边缘、反思与批判的立场是重要的。批判不是为了颠覆与破坏，而是通过不断地悬置与提问、持续地解构与建构带来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看到更多的可能与角落，从而也朝向更为公正与善意的道德与秩序构建。这种批判性，指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指向包括教育机构、编辑出版在内的学术体系，也必然指向我们自己。

刘亚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兼论对性别研究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策略研究院社区发展研究室副编审)：在女性研究方面，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是构建以中国女性为主体的社会研究，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以中国为主位，以女性为主体。首先，以中国为主位，强调民族国家的维度，大而言之，还可以是人类延续的维度，这是女性发展自身的背景和条件。其次，以女性为主体，也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涉及女性作为人的人性假设问题。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认为，人有三方面的含义，即通性、个性和性别，分别对应着社会秩序、文明进步和人类繁衍三个方面，其背后的人性假设内容包括三方面：社会性、文化性和生物性。以此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思想的目的，就是让女性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能够安所遂生，即安其位，遂其生。

其中的一个要义是将女性作为一个整全的人的形象去研究，也就是说不能将女性作为一个被割裂的对象，而忘记研究的最终目标。但在学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我们多将学科范式作为问题研究的框架或前提，这就忘记了被研究对象自身的整体性。女性研究也是分学科甚至是分派的，这就容易导致

对女性的认识不够全面。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本身是一个整体存在，既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改造社会的主体。

这里，潘先生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思想，可以为未来的性别研究提供启示。潘先生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纲六目”理论中，其中“个人”一纲包括通性、个性和性别，“社会”一纲包括社会秩序、社会进步和文明延续。他强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在他的性别观念中，尤为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这与女性在外的事务(和个性发展)之间会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冲突。潘先生从民族和文明的延续角度，认为女性应该优先履行其家庭职责，同时认为，在社会上应该有一种教育，其隐含的意义是让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家庭在社会和人类延续中的价值，事实上也向社会表达了女性在这一功能中的重要地位。不过，迄今为止，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家庭依然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相应地，女性依然处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等繁重家务劳动和社会事务的张力中。事实上，潘先生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了女性的通性、个性和性别的均衡发展思想。我认为，他的思想对女性研究的启示是：改善社会环境，发展一种让女性自愿兼顾家庭、同时有利于女性身心的社会理论。

根据潘先生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思想，应该将女性作为一个整全的人的形象去研究，不忘记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深陷学科范式、派别之争。女性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女性认识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然后在政策上对女性的生活和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这就需要既考虑女性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又考虑女性生存须臾不可离开的背景和目标——民族和人类的发展。女性一方面有自己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把这两方面平衡起来，女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整全的人，也才会安所遂生。

整全的女性形象更涉及女性自我人格的养成问题。按照潘光旦先生的说法，它主要包括“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其中涉及客观认知自我的知识，不仅局限于个体的知识，也包括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认识自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客

观化自我的过程。潘先生比较重视“自我控制”,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按照这一看法,女性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而不是泛滥无归的自由。

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目的就是让人(首先必须包括女人)能够获得一份反思自身命运的力量,而所谓人的成熟与否,就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不过是我们能否有勇气来面对这样的历史命运,能否在我们的现在和历史的限制中,找到抗争的力量,以及面对这些限制的自由力量。

马冬琦《性别社会学再出发:从女性的人性假设谈起》,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世妇会召开 25 年以来,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刻改变了学术领域、社会现实与性别观念。但是,在社会学专业领域,社会性别意识还没有成为学者们普遍的自觉。在网络媒体上,出现了性别对立与撕裂现象;在学者特别是男性学者那里,对性别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并未成为普遍的兴趣。学科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及理论与生活之间的这些错位表明,性别社会学研究面临着反思的必要性:25 年来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偏与蔽?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继承和超越?

社会性别理论假设了一个有性别利益的现代化的人,而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则强调人的通性、个性和性别,费孝通更是提出了人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观点。社会性别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因为申张人的个性而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有利于推动社会逐步放开对女性的限制,有利于推动个体的伸张和个体生命力的发出以及推动文化的自我审视及发展变迁,这些都启发了知识的生长。但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一定程度上亦存在偏和蔽的现象。例如,两性作为生物人的差异容易被悬置、否定或质疑;过于强调分析两性的社会境遇差异,相对忽视女性的主观感受和两性的互动;在将传统文化作为父权文化加以批判时,缺乏历史的同情心等。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固然存在父权制的一面,但也存在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和而不

同等平等、和谐的观念,存在对女性生育功能的肯定、尊重、保护母性等有利于妇女福祉的因素,存在着将社会视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因素。传统文化不仅过去具有功能性作用,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可能发挥作用。

因此,要构建以中国为主位的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应以男女个体的安生与社会的和洽为研究的价值取向;将女性视为生物—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主体;在研究内容方面更加重视实然而非应然;在研究方法上,从个体主义迈向个体—社会—文化互构论;在研究方法上,宜持开放心态,注意跨学科的融合与跨文化的比较等。

### 第三阶段

丁瑜《从我身边的社会工作服务反观性别理念与实践》,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当今的性别理念、性别平等思想在实操和社会服务层面如何“落地”——性别意识、理念和存在的问题在实务中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其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妇女服务和更广阔层面上的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要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这是我要谈及的主要内容。

妇女社会工作服务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妇女服务表面化。社工一定程度上“先验”地将妇女服务与做手工、厨艺、吃喝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时会不假思索地开展这类活动。“最美”“和谐”类的服务也很容易掩盖家庭问题,将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简单化,将妇女限制于隐忍、克制与妥协中。第二,社工在家暴、亲密关系暴力、婚外情、性骚扰、性侵害、失独等问题上回应有限,他们只能做浅层工作,无法深入、长期、专业。第三,妇女服务一般化。无论是针对困境妇女服务还是常规妇女的服务都做得不够,比如前者多限于经济、物质和法律援助,而后者大多只是“锦上添花”的活动类型。第四,社会工作服务仍具有“责怪”思维,社工缺乏性别意识,在教育源头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五,社工服务容易忽视不同服务对象的“性别特性”。第六,社工服务落后于社会学研究,无法在实务上回应性别观念的日新月异和发展变化。

我们在广州市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结合GIS、AWS和SRES量表对全市33个社工站的社工及负责人进行了性别意识调查,目前回收问卷340份,经过初步分析发现得分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到底是知行合一,还是知行不合一呢?知行合一是指性别观念不强,所以提供出来的服务差强人意;知行不合一是指一些人在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性别意识较先进,但在实际提供服务时不能体现出来,这说明实务是有难度的,而且性别理念的贯彻与实践具有困难性且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项目的设计、周期、评估方式等,都值得进一步分析。

分析其原因我们发现,父权制思维存在于服务的全过程与各层面。第一,妇女经验由于其日常性,容易被社工、学者所忽视,未能进入实务/研究重点关注的范围,未能在需求评估、服务设计与研究议题中被认真加以考量。第二,社工/研究者与作为服务对象的妇女间的关系常常是不平等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研究和实务远离了妇女的生活情境,但作为被服务对象的妇女,很多时候又缺乏发声的意识和渠道,很容易被遗忘在研究和实务之外。第三,社会工作实务有微观化、个案化倾向,服务缺乏清晰的规划、目标、意识指引及合理结构,难以发掘个案所揭示出的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对提升整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鼓励妇女社会参与、改善性别环境的要求无法很好地回应。妇女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也常停留在个案或微观层面。第四,社会工作的领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群的切割,个案化的实务与研究倾向也将妇女从其所在的社群、社区与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忽视了妇女问题的交织性与个人问题的社会性,个体问题在社会上的根源和意义被忽略,社会工作改变社会结构和不合理状况的功能被遮蔽,影响了社区自身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因此,社会工作的传统实践是性别中立的,它产生的问题是根源性的。没有性别意识的社会工作只能说是反映与处理一种普适性视角下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在处理妇女事务上,这样的社会工作是“半意识”或“无意识”的。一切问题的核心,在于从已有实践中对社会工作进行彻底反思与重新审视,承认性别中立社会工作的盲区。女性主

义社会工作是一种从源头上对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的重新定义,它不止停留在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地位上面,更是聚焦于个人经历和公共议题间的研究,服务于研究中平等对话关系的营造,以寻求与各类人群并肩工作的方法。具有性别敏感度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不是工作对象的简单改变,而是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范式。

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努力,以开拓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研究与实务。第一,重视社群层面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作为多重交融的平台已开始有学者去研究,社会工作的大部分研究议题和实务都在日常生活中,以这个概念作为理论框架和脉络来研究与开展服务的却很少,这个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缺乏这方面的表达。另外,现在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多集中在身体和性上面。我们应超越这种关注,超越个体经验阐述,迈向更具有联结性的社群层面,注重自治与参与能力的培育。第二,重视联结、结构与整合。妇女服务的困局在于无法形成不同群体的相互支持网络。对妇女研究来说,新自由主义下女性主义强调个体的批判框架无法很好地批判结构性的不公。因此无论是实务还是研究都不能仅停留在分析个人问题上,要将不同妇女群体间、妇女与其他群体间的联结纳入讨论框架,使社群或社区共同体的营造成为研究的核心关注点。第三,重视平等对话关系的营造。第四,共同参与的行动取向。以上几点最终都要与行动勾连,如果没有行动就不能突破这些局限,而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个人重回集体,以集体力量帮助个人面对困境或条件与结构的制约。

李涪《性别之重:我们为何需要“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长久以来,在主流经济学中,对“生产”的讨论仅包含市场交换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将第二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称为“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理论”就是要考察国家、劳动力市场、社区和家庭在儿童抚养、老年照料、家务劳动、社会维系等不同类型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如何在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现实情境下实现动态发展与平衡。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分析和呈现性别议题具有

重要作用,对推进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下的性别研究提供了很多鲜活有趣的案例,但其主要侧重对个体生活的策略式分析,而与主流社会学的学科对话则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到劳动力再生产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基础,中外社会史的考察都揭示出社会共同体对再生产劳动不同形式的参与和分担。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性趋势表现为社会公共部门不承认其成员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将其视为个人家庭事务,并通过将再生产劳动从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上剥离,带来了再生产劳动公共性与其私人化之间的巨大紧张和矛盾。“再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屈从性位置对理解当下诸多性别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分析价值。

第二,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论,亦即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话语或者话语认同的上层,而是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对家庭和男女两性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展开翔实的资料分析。以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为例,可以看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决不仅是人类“自我保存和繁殖本能”的产物,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社会系统和行动主体在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相互博弈和角斗的产物。男女两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和生产、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是由行动主体自身决定的,而是受到资本市场需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要求、国家福利、外部社会支持纽带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下主体应对的产物。这也提醒我们,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特征与差别,这对分析和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三,为搭建全球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是北欧国家与女性的结盟、公共资源向再生产领域的回流以及由此导致的外界对福利国家在公共与市场领域中的性别隔离与效率状况的质疑,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倡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照料责任的空缺与转嫁以及家务劳动市场化与商品化进程,或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母爱剥

削链”和单向度经济赋权背景下的女性发展悖论,东亚国家在现代化早期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的生产主义模式在当下所遭遇的“低欲望、低生育率”冲击,中国与上述国家都不尽相同。中国具有妇女解放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市场化之后又经历了家庭关系的一系列应对和调整,未来也同时面临着人口政策和社会老龄化的一系列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生产—再生产议题,上述比较框架特别是与我们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更为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和实践,为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警示及理论想象的空间。

第四,揭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重。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我们学校的师生在结合自身调查经历的基础上进行了非常好的研究探索:一位本科生研究了卡车司机的男性气质如何永不停歇地奔波在劳动运输的道路上,而无法停歇下来履行自己的再生产责任,家庭似乎只是其奔向下一个目标的驿站;一位来自卢旺达的研究生介绍了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劳动力的紧缺需要女性进入经济和政治等公共生产领域,所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推动性别发展的政策决定,2013年前后,卢旺达实现了女议员比例全球第一(63.8%),性别平等指数全球第六;然而,这些妇女还需要承担繁重的人口再生产和劳动,作为灾难之后的第一代女性领导者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与苦难。上述研究验证了该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分析和应用基础。

第五,与时代发展动向和主流社会关注相结合,能够帮助性别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展开持久且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该理论与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已经有很好的对话基础,在国家与女性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影子教育与社会不平等、户籍制度与城乡差异、再生产劳动的时空特征、20世纪以来关于再生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诸多社会学分支学科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和对话空间。

综上所述,“社会再生产理论”能够帮助性别社会学跳出精英主义、原子主义和认同政治的狭小话语范围,在扎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将性别议题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开展广泛且持久

的对话,走入社会学分析的核心话语圈。当然,该理论也需要在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概念体系框架和具体分析工具,从而帮助中国性别社会学与国际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性别社会学——的交流和对话。

肖索未《照料中的阶层与性别:交汇性理论的本土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女性主义有两大传统,一是女性赋权,女性应该展现她们的天分,发挥一切潜能,和男性并肩,这个传统比较容易纳入“个体主义”框架,在现实中,更多地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抱,在(中产阶级)社交媒体中的显性化,是一种关于性别的“进步认知”;二是“女性”价值的传统,重视并强调照料/关怀他人的责任和价值。这里的“女性”是指因为女性长期从事照料的工作而形成的某种特质,而非女性天生使然。但这种“女性价值”是对个体主义的反思,强调人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照料的实践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即对个体独立性的幻想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强化,凸显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依存乃至纠缠的实践。照料者不得不去了解被照料者的需求和想法,搁置自我,并且从他人的成长和成就中获得满足和乐趣。这是一种以他人为指向的行动,并且需要与他人发展相互联结的能力。但在现实中,这种“照料/关怀”的价值往往被“女性本质化”,更多地被“传统美德”所裹挟。

照料是指维持人们日常生存以及代际更替所涉及的关系与活动,包括对人的直接照顾(生理、情感及其辅助活动),比如做饭、洗澡、采购等;维持人们生活的周边物理环境,比如打扫卫生、整理床铺等;以及培育人们的关系和社会联结,比如协调家庭关系等。照料具有私人性(需求个体性,难以完全标准化)、关系性(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需要发展出必要的关系)、情感性和身体性(亲密接触乃至身心依赖)。

照料被赋予“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同时,往往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上处于“贬值”的境地,照料被视为女性“天性”从而被“去技能化”,再生产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从属性、辅助性存在,以及在(新)自由主义下对理性独立的个体认知导致对强调依赖性、关联性和情感性的照料劳动的贬低。在这样的背景下,

照料劳动往往成为某种“负担”而进行社会转移,从男性转移到女性,再从高层女性转移到低阶层女性。在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从年轻女性转移到老年女性(及男性)、从城市女性转移到农村女性的情况。

现在很多研究都与照料相关,只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切入,比如,“家务分工”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切入,代际照料合作从家庭和代际关系的角度切入,家政工主要从劳动的角度切入,留守儿童主要从城乡流动和城乡不平等的角度切入。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照料实践?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如何从分散的照料实践来透视照料体系?

我希望通过引入一个女性主义近30年发展中比较重要的流派——交汇性视角(intersectionality)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这是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女性主义理论流派,源于对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验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该流派指出,女性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各种结构性的力量互相交织形塑女性的生存机会、生命经验和身份认同,这些结构性力量包括阶级、种族、公民权、性向、年龄等;社会不平等的多元性和交织性——多重压迫机制,范畴交汇之处也是不平等汇集之处。社会群体因其所处社会位置的差异而获得不同的视角和知识(立场理论)。

我们如何在研究中应用交汇性视角?交汇性视角在西方的发展后期出现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维度叠加、差异细分,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范畴过分细化的误区。但在交汇性视角的诞生之初(以及Collins对交汇性视角的澄清中),一些经典研究(比如Patricia Hill Collins和Evelyn Nakano Glenn)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重要见解。这些研究强调的是,突破单一范畴、二元对立的分析思路,关注不同范畴之间的交织建构、系统性关联;关注“过程和情境”,即各种结构性因素(阶级、种族、性别等)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地位及身份;强调宏观与微观的勾连,通过历史—制度分析等方法,关注影响身份形成过程的复杂社会系统;这些复杂的系统如何将性别、种族等因素嵌入所有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源的分配等社会过程中。

透过交汇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照料体系,深

入思考中国目前的照料性别化、阶层化的照料组织形式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包含着市场改革的变迁、从市场改革前的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认可,但从属于生产劳动、照料组织在传统性别分工基础上辅之以一定的公共组织,转变到市场改革后“无偿照料”进一步贬值(需要缩减的成本),照料劳动通过商品化/市场化获得(经济)价值,照料组织的家庭化和市场化。我们可以问:在照料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变迁中,处于不同社会位置(阶层、城乡、地域等)的女性和男性以何种方式被卷入,对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产生了什么的影响?我们的照料体制如何建立在性别、阶级和城乡结构的交织关系之上,又对后者的动态变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关于照料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与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形塑力量,比如,为什么“四川/南方阿姨优先”,而“东北、河南阿姨无缘”?为什么80-90年代是“小保姆”(未婚,20岁左右),现在却变成了“阿姨”(已婚已育,30-50岁)?其次,关于照料中的性别、阶层与流动,比如为什么农村的留守儿童是问题,而城市的“丧偶式育儿”只是吐槽?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再次,关于商业化照料的“得与失”,比如家政业的兴起、照料的商品化以及“职业化”,谁是受益者?代价是什么?谁在承担代价?如果日常的照料被不断“外包”,家庭生活剩下的是什么?家人间的纽带以何种方式在维系?最后,关于照料的未来想象,比如,家政服务的雇佣双方是否能够建立起超越市场关系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社会关系又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城乡和阶层关系?我们能否建立起超越(至少减少)性别和阶层不平等的照料体系?以及如何建立这个体系?

#### 第四阶段

金一虹《性别化的劳动世界及变动:脉络与逻辑》(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决定了什么样的妇女劳作是“工作”,什么样的妇女劳作不是“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适合男性,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女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

所说,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起码和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历史一样古老。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普遍的,又是等级制的,它决定了男女两性将与何种劳动组织模式相关联以及资源、权威、价值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也决定了男女两性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但是,基于性别的分工又是复杂和多变的,它随着社会性别规范等制度性、非制度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所谓传统小农经济的“男耕女织”模式,不过是尽显农业社会由男性主导女性辅助的价值分配的一种“修辞”策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既有男女“耕”与“织”的交错互换;有曾由女性主导的“女性工业化”的历史,也有延续至今的农业劳动“女性化”。

在农业社会男女两性“耕”与“织”分工的变化以及从前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过程中,农业劳动的性别分工及“分工图景”不断被形塑和改写。造成这种变化的,除了人口、土地、技术、经济组织、家庭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之外,还有性别规范等非制度因素的制约。掌握着生产、生活资源以及性别规制生产的男性,在变迁过程中掌握了分工的主导权;而分工变换带来的工作模式、权威、价值、等级的重新配置,对女性而言往往是“下行”的,如她们的劳动更加密集、通常滞留于传统部门而难于进入新兴经济部门、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以及伴随男女劳动分工的调整女性聚集的部门职业声望降低等。

如何看待农业女性化和未来的趋势?农业劳动的女性化趋势与乡—城流动的性别化差异的长期存在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在放开乡—城流动阶段,为什么男性依然能保持流动性优势?所谓“新兴部门总是吸收优质的劳动,而把弱质劳动留给传统部门”说,前提是把妇女限定为非理想、非标准员工。究其根源,“主内”和“主外”不仅是一种“传统规范”的延续,而且是对流动妇女“母职”的重新定义,成为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雇佣的策略。女性受限的不仅仅是在外部空间流动性,还有内部空间的非生产化。妇女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因隐蔽于公共视线之外,而极易被视为“自然化的”“女性化的”“私人的”,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从农业经济发展角度看,农业女性化优于农业的老龄化,但是未来乡村和农业发展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是否

有利于女性经济赋权,也有诸多不确定性。

工业化使妇女得以进入公共领域,性别的不平等从隐性化到显性化,其深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妇女的抗争,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点。在当今的劳动世界中,既有针对女性就业设置更高的“玻璃门槛”,有女性职业上升通道的“玻璃天花板”,也有职业性别隔离之“墙”。但是更应该看到,女性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中,不仅被“配置”、被“结构”进某种劳动体系之中,也有改变和再结构化的力量。例如,在1982年时“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化”职业类型(女性仅占38%),之后女性所占比例不断增加,2000年开始超过半数。这是21世纪以来极具积极变革意义的变化。

苏熠慧《回归劳动——对中国性别社会学发展的反思》,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作为青年性别研究者,我常常有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是有关历史记忆的断裂,即女性主义者从本土实践中生产知识并进行代际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第二个困惑是“社会性别”在全球化背景下进入中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所呈现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闵冬潮老师曾经写过《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sup>[2]</sup>,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旅程看成是“社会性别”从西方语境的脱嵌和在中国本土语境的再嵌入过程,即“社会性别”脱离西方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结构背景,成为一个抽象概念,又重新嵌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的过程。第一,“社会性别”进入中国是在西方性别主流化之后。西方性别主流化影响下的学科建制,让“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用来分析主流化后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性别主流化才刚刚开始。第二,社会性别研究在西方与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紧密结合,其知识生产也来源于运动,但进入中国之后却出现了去政治化的特征。第三,“社会性别”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的时候,西方正经历新自由主义转型,在研究范式上逐渐呈现个体化的特征。同时,中国也在经历两个重要的变迁:一是集体生活的松动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二是市场改革的推行。这种巧合使得中国的性别研究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呈现出一种微观和个体化的形态。“社

会性别”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复杂现实之间存在张力,研究者在使用这个概念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和去情境化的状态。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也往往将女性作为一个无差异的抽象整体来考虑,而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各种差异。

这两个困惑促使我去思考应该如何突破。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性别与劳动研究)出发,一个初步的设想是将劳动视为中介,去缔结中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不死灵魂。一方面在二者的比较和联系中寻找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寻找中国自己的历史进程。这个探索的第一步,是对劳动的扩大再定义。过去我们关注的要么是公共劳动,要么是私人领域的劳动。实际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统一直关注再生产劳动,不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讨论,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理论,都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劳动的反思和拓展。这些理论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强调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不可分割性;二是强调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因此,如果我们把“生产劳动—再生产劳动”作为第一个维度,将商品化作为第二个维度,那么两个维度所构成的新框架对劳动内涵的解释会更加丰富。第二步是以劳动为中介去探寻“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传统变迁。今天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消费社会崛起,消费主体凸显,人们往往以消费者而非劳动者的身份来认同自己,但现实恰恰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不断卷入的劳动程度和消弭的劳动主体之间的张力。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像“尊严”和“光荣”等与社会主义传统相关的劳动话语在转型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甚至消弭的。这个变迁本身也展现了宏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第三步是以劳动作为中介去对话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的各种概念。虽然今天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已经形成各种概念,例如情感劳动、审美劳动、情感表意劳动、身体劳动和亲密劳动。这些概念看似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但背后始终萦绕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是对于阶层和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如果再向前延伸,其实就是对于资本和父

权的批判。这种双重批判恰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不愉快的“联姻”。在这场不愉快的“联姻”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一元批判,强调对资本和父权的二元批判。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在二元基础上加上种族,形成对资本、父权和种族的三元批判。在这些问题意识的关怀下,我们也可以思考在中国各种力量(包括国家)如何通过劳动分工形塑性别、阶层、种族等多重主体,思考各种权力如何作用从而形成相互交织的不平等,思考这些主体如何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缔结。第四步是以劳动作为中介思考如何在本土的实践中去生产知识。自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我们进行了许多围绕“劳动”的本土实践。实践者尝试基于性别、民族和地域等纽带形成支持性网络。我自己从 2013 年 1 月开始尝试在职业学校里组织女生互助小组,通过互助小组的方式来尝试提升农民工子女的性别意识,这些性别意识包括如何认识自我和如何增能。在上海,我们和一些社会组织合作,成立流动妈妈互助团,围绕着生育、养育孩子形成彼此支持的团体。在这些大量的本土实践中,我们可以进行自己的知识生产,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对话。最后一步,我们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多元的主体。通过劳动寻找作为个体的意义、个体之间的连接、个体与历史之间的纽带以及个体与宏大结构之间的联系。

#### 延伸讨论:发展中国的性别社会学

张李玺(中华女子学院原院长、教授):我想谈谈中国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

一是在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基本概念等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再认识、再定义。我们今天讲传承,离不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 25 年前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们从那时开始知道、接受、传播和实践,与国际妇女运动不同的是,95 世妇会前后“gender”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社会

和学术界时,已经不是一个纯学术概念的传递,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面颠覆了传统上女性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是一场从学术到实践、挑战权威的思潮。当时'95 世妇会的很多参与者,在之后发表的很多文章中,都用了觉醒、兴奋、惊讶还有汲取等词语来形容当时受到冲击的心情,当时对新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我们特别想把这些新的东西移入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例如高小贤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蓝宝书”,当时我也是“蓝宝书”的编纂人之一,我们在编写这本培训教材时,翻译和阅读了很多书籍,也尝试对社会性别等概念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当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符合中国社会的背景,加之又是培训教材,当时多次走访学校和机构,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在做完稿时,还把老公抓来,让他们参与到培训中,以进一步倾听男性的建议。这本简单的小册子,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

在当时的环境中,社会性别、性别平等、性别敏感、妇女解放、平等这些概念大量涌入,或者被重新讨论,对学术界带来的冲击很大。尽管目前我们还在用同一个概念,但早期讨论的问题和现在讨论的问题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说需要再认识和再定义。例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早期我们在培训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和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参与培训的男性问“你能扛动 200 斤的麻袋吗?你不是吧?你不能为什么要和我平等?”我们基本就在这个层面上和大家一起去理解平等,平等的目标是“同”,同等机会、同等权利。前几天我看到沈奕斐的一篇文章,写到求同存异的问题,我们对平等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基于生理性别的平等,或者说多元化、对平等多元化的理解,等等。又如妇女解放,我们以前说解放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独立,现在说妇女解放,则又涉及自由选择,我自己也在一篇小文章中说到,只有在女人可以自由选择时,解放才成为可能。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对于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所以在发展中国性别社会学的时候,一些基本概念仍然需要再认识、再定义。

二是发展中国性别社会学,一定要坚持问题为本和妇女为本。问题为本,就是要发现问题,关注现实,关注妇女特殊的需求,关注妇女不同阶段的特殊

需求,关注不同妇女群体的特殊需求。在关注这些特殊需求的时候,性别视角是不能缺失的,这也是中国性别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必要基础。同时,在强调性别视角时,也要关注女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因为关注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我上次参加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家庭变迁研讨会时,有一位老师谈到他对“老漂族”的研究,很有意思。很多人都在讨论祖辈照料孙辈的研究,有些人提出,国家应该对参与照顾孙辈的老人提供政策支持和相应的照顾。但紧接着有人提问,如果政策支持的话,是不是会继续强化女性的刻板角色?是不是会进一步增加女性的负担?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答案不应非此即彼,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解决眼下困难的同时,推动有性别视角的家庭政策出台呢?在关注女性眼前利益的同时推动长远利益的实现呢?我们只关注现实问题还不够,还要关注女性的特殊需求;只关注女性的特殊需求还不够,还要关注女性在不同阶段的特殊需求,以及不同女性群体的特殊需求。所以,发现问题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要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不仅是做行动研究,更重要的是成为推动改变现状的主要力量。

在谈到传承时,很多年轻学者认为“你们那一代人有资源、有平台、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氛围,等等”,总而言之那种特殊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没有对妇女问题的感情,没有推动改变现状的理念或者理想,没有传承和反思,要发展本土的性别社会学是不可能的。

三是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离不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土壤和脉络。2013年中华女子学院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主题是“女性社会学的知识建构”。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如佟新、吴小英、郑丹丹、王金玲等都参加了这个课题,最后我们共同出了一本专著。当时请陆学艺先生写了一个序,他评议了两点。其一,特别赞赏不同机构的专家学者在不同领域做了同一件事情,这对推动女性社会学的知识建构非常有意义。其二,学科化的建构要更好地扎根在中国社会中。就是要学会讲故事,要学会讲中国故事,要学会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所以,我们需要有相

同的概念才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我们需要有共同的视野才能够发现和研究问题,但显然,我们也一定会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和路径。

本土化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做研究时,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研究婚姻冲突时,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角色期望和权利平等是20世纪60年代婚姻家庭研究学者非常关注的两个概念,我也选择了它们作为分析架构中的基本概念。但分析过程中发现,西方人在婚姻冲突研究中涉及家庭中间的权利概念时,用的词基本上都是政治学的,比如妥协、斗争、谈判、平衡等等,我发现我无法运用这些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之间的权利不平等不会通过谈判、妥协、斗争等方式去解决。因为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比如工作是分配的,房子是分配的,哪一年生孩子也是分配的。这时会发现西方的成熟的分析框架走不通。在认真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我突然发现“面子”这个概念多次出现在关于婚姻冲突的描述中。外国人对此非常不理解,也不知道面子和权利有什么关系,但当一个中国丈夫说“妻子让我很没面子”“她丢了我的人”时,就会发现原来“你(妻子)是我(丈夫)的”。像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只有扎根在中国土壤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思考,才会明白,才会有有的放矢。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极其深刻,当时在一个讨论会上,一位长期关注妇女研究的老领导问我“你们老说缺乏性别敏感、性别盲点,我要是批评一个省长,我说你就是大男子主义,他就知道我说啥。我要说你性别不敏感,他就不懂我说啥。还有,男女平等我们推行了几十年了,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男女平等,你现在讲性别平等,那你就得跟我说明白、说透了。”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仍在思索的过程中,不是说不明白这些概念上的差异和解释上的不同,而是如何去面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如何在发展中国性别社会学的过程中始终置身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土壤和脉络。

四是作为性别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人员,仅仅对性别研究有兴趣是不够的,坚持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也是远远不够的,你只要选择了做性别社会学研究,就需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今天讲

传承，95 世妇会带给中国女性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是我们看问题的新角度、善于发现问题并愿意去推动和解决问题的激情，是一种奉献的精神和永远的执着。所以，作为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要想更好地使这个学科扎根社会，有生命力，有影响力，就必须投入推动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去，不断地奉献和追求。

王金玲（浙江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我想就近年来中国性别社会学发展的特征包括结构的转变，与大家进行探讨。

作为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学科的交叉点上，我一直认为和主张中国的性别社会学（包括妇女社会学）具有以下四大基本特征。

一是以“性别人”为基本理念，强调人的性别属性，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性别人组成的社会。二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强调“性别 + 本土”的证伪，即证明主流社会学尤其是男性主流社会学和以美国为代表（近 40 余年来较多的是引进来自美国的相关理论和概念）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的非普适性，挑战他们的话语霸权，进而以“破”字当头，建树自己“性别 + 本土”的话语及话语体系。三是强调参与者的主体性以及主体责任感，即学科参与者具有主体性角色身份，拥有主体性地位，发挥主体性作用，并由此具有推进学科发展，以学科发展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承担相关的主体性责任。四是以行动性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路径。即强调知识的行动化和行动的知识化。所谓知识的行动化，是指所有性别社会学的知识都应落实到具体行动、社会行动上，能够有助于社会行动，推进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所谓行动的知识化，是指有关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行动所产生的经验应该凝聚成为一种知识，形成妇女的知识、性别的知识、本土的知识，进入知识传承的体系。这两者应相互促进，形成回馈路线，由此推进社会变革、新知识的传承及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进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世妇会后得到迅速发展。考察近年来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应该说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性别社会学学科地位进一步稳固，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展，

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力量不断增强，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倡导成效显著。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在学界的认同度和接纳度日益提升，已成为其他诸多分支学科如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青年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等的一大研究内容。第二，具体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形成了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次之、质性研究成果迭出的态势。第三，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主流学术中的呈现度和认同度日增，主流化程度有较大的提升。第四，年轻人，尤其是经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成为研究与教学的骨干力量，并迅速成为本学科的核心力量，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建树学科主体性地位的学术能量在增强。第五，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为牵头人和骨干/核心力量，在国家层面，对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政策倡导取得较大成效。反对性骚扰、“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等研究成果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然而不能不说，近年来，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学科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在研究中，“性别”更多地作为一个指标，较少地作为一种视角或分析范畴，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指标，绝大多数也仅包括男女两性，性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而性少数群体及其相关的权利已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显化。第二，“性别 + 本土”的意识仍较弱。主流社会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概念在学科中具有某种支柱性的力量，对这两者的证实多于证伪，借用多于批判，中国的性别社会学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国妇女有自己成长的道路，比如，如何认识作为妇女参政形式的街头巷议；又如，公领域和私领域，在西方妇女的生活当中是分得很清的，在中国妇女就业过程中则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第三，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定性研究退居其次，定量研究独占鳌头。而更具证伪意义的质性研究方法不仅运用者较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较少。第四，行动性减弱，不论是行动性研究还是研究性行动均较大幅度地减少，学者和教师更关注学术性研究及研究课题，行动性的项目则退居边缘，知识的行动化和行动

的知识化进程减缓。第五,学科力量(包括科研与教学)的组织化程度降低,更多地具有个体乃至个体带动的特质,近年来中国的学科化进程有所减缓。

在成就与不足的两向发散下,近几年来,中国的性别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其研究结构从基础性的行动研究力量较强/成果较多、中间层的应用研究次之、居于上层的理论研究再次之的正三角形结构,转变为应用研究力量较强/成果较多、行动研究和理论研究力量均较弱/成果较少的橄榄形结构,并在这一核心变化的结构性张力的推进下,学科化进程的结构(以行动为基础层、以普及为中间层、以研究与教学为上层)也出现了从以行动层最强最大、普及层次之、理论层又次之的正三角形结构转变成研究层最强、普及层次之、行动层再次之的倒三角形结构。我认为,对于这一变化的结构和结构的变化开展分析和研究,是对中国的性别社会学乃至妇女/性别研究进行现状评估和未来规划时必不可少的。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我非常同意张李玺老师的说法,就是性别社会学研究要有使命感。我坚持认为,性别社会学的使命感就是要对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进行研究,找到其得以生产的机制,并寻找可能实现性别平等的出路。目前,有不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选择性别视角切入来做毕业论文,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体现了学生对性别问题的兴趣,且这些兴趣常常和自己的生活感受紧密相关。那么,我今天就以我指导学生做性别社会学论文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和讨论,如何通过做论文实现性别社会学研究的使命。

向大家推荐金一虹老师的诸多研究,因为她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来回应性别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过,21世纪社会学会有长足的进步,这个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曾经被忽略的人类的另一半人——女性开始说话,开始揭示她们的经验;当女性的知识进入社会学就会有更多的知识得以生产。性别社会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性别知识的生产,去揭示历史的、生活的真相。

在今天会议的聊天中,有不少人问为什么护士、家政工或幼儿园老师主要是女性,为什么她们的工作

资比其他职业低。这些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司空见惯里,女性做了大量的事情,但又有谁能够真正说日常生活中女性在做着什么?她们所做的工作是否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何在?第一,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即描述一类女性的工作,如家政工、全职妈妈、公司女白领等,每一种工作中都内蕴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性别的知识。事实上,对于诸多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并不知道其具有怎样的特点。就如同我们不知道,大学校园里住在半地下室里的、打扫卫生的阿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当然这不仅限于劳动方面,还有恋爱、婚姻、疾病等诸多问题。第二,如何能够很好地回应“是什么”的问题,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今年,我的博士生陈玉佩做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研究,她用半年时间亲自到幼儿园做了一名老师。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扎实的田野工作做基础,如果感受到写不好,自己都不满意,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调查工作和田野工作做得不够。她在田野工作中,感受到幼儿园老师工作中情感的付出与家长的挑剔,感受到来自小朋友的信任和内在的喜欢,感受到时间和情感付出与收入的不匹配。只有在亲身经验里,研究者才能够感受到种种“不平等”,才能够描述出其特点。第三,面对种种不平等,我们的学术任务是寻找产生不平等的机制,这一机制一定是性别化的,揭示性别因素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例如,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是如何在性别分工的意义上被女性化,从而被贬值的。又如,有博士做快递研究,快递工作是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当回答为什么男性有强大的动力去加班跑快递时,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性别逻辑,他们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使其能够忍受不平等的阶层关系,且这种性别逻辑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文化基础。李洁老师和肖索未老师讨论的再生产劳动都在揭示性别不平等的内在机制。第四,性别研究的使命不仅是了解真相,还要把被遮蔽的东西赋予其知识上的价值,即创新性别知识,对社会学的知识做出贡献。如金一虹老师重访江村,在对妇女的口述研究中,揭示出江村中的女人,不仅具有生养孩子的功能,她们对家庭生计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女性的劳动在乡村经济的研究中是无

声无影的,重新看到乡村经济中的女性劳动,并赋予女性劳动以价值就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巨大的贡献。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展示被遮蔽起来的性别真相,这就是对性别知识的贡献。

性别社会学发展到今天,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看到现实中性别关系的真相,说明其“是什么”,解释其“为什么”,并在概念和理论意义上找到恰当的分析框架,由此形成研究的基点,在一块块的基石上,使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走得更长远,更有创新性。

吴小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的性别研究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积累,无论在学术规范还是学术影响力方面都已获得了主流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可,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目前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作为骨干研究者,更是具备了优秀的学科专业训练基础以及海外求学或交流经验,因此,经历代际更替后的性别社会学不应再把学科化当成重要目标,反而应该淡化性别本身的学科痕迹,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话语方式,以专业化、学术化的姿态融合到现有的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当中。

性别社会学想要更加深入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需要在研究议题方面紧密结合本土情境,而不是单纯地被西方学界的热点带着走。与此同时,由于性别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与西方女性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随着时过境迁,需要重新检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同时密切关注当下世界文化和思想潮流变革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性别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基于身份政治,其中对女性命运和主体性的关切以及对于性别歧视和宰制的批判是其共识和前提。在如今的全球化潮流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扩张以及文化领域对于所谓“白左”的“政治正确”传统的讨伐,都给学术和思想界带来新的纷争甚至撕裂。国内学界面临的思想和文化环境虽然有所差异,但是互联网上关于性别话题的争议以及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观念和立场分化也表明,性别社会学的学术与政治、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厘清。

性别研究在知识界的主流化,很大程度上仰仗

于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带来的不平等议题和底层研究的兴起。然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基于身份政治和边缘立场的知识普遍性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表现在知识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并在性别社会学中体现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传统,例如,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被广泛讨论和应用的交叉性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21世纪以来国内的性别社会学尽管在议题上得到很大扩展和深入,例如性和身体研究的日益丰富、母职和照料研究的兴起等,不同领域的交叉研究也令人欣喜,如劳工与性别、分层与性别等,但是关于概念和理论方面的探讨几乎没有多大进展。而学者之间在有关平等与差异、结构与自主、国家治理与个体选择、精英主义与底层主义等等问题上的争议和分化倒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形成一定的交流隔阂。打破这种部落主义式的封闭疆界,将有利于性别社会学走向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执行主编):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公道及其对于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可能启示》。这个发言会分五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讲性别研究为什么会崛起。这里有一个现代性的逻辑。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现代社会的难题也是个人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必须放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来研究,性别问题可能亦如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问题不仅是女性的问题,也是男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中,不仅女性要脱离大家庭的压迫,男性同样如此。当然,男性要比女性自由得多,在男性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个人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可能是性别研究的来源。

第二部分,我想想象一下性别平等在历史上的变奏曲。我猜想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父权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不用多说了。第二个阶段可能国内学者提的非常少,但我觉得比较重要,也就是母性地位提升的过程,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女性成为家庭的道德楷模。家庭团结的纽带也会从父权转向母爱。这个背景是家庭核心化、平等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形势。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发生的比较少,但在西方历史中,尤其是在新

教历史中特别重要。如美国的小说《小妇人》,其中教育的核心就是女性的美德、自立、自我控制,父亲也转化为爱的形象。《飘》中艾希礼的太太媚兰在美国南方重建时期的角色转换,即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换,甚至成为整个亚特兰大南方男性和女性的母亲,就表达了母性地位的提升。母性的彰显和性别的平等又分工合作,在西方历史上被认为是现代共和制度想象的基础,也是现代性彰显的基础。第三个阶段进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平权阶段,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浪潮,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浪潮。这种浪潮在西方和东方是同时发生的。这样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学说或者个人主义学说发展到极致,实际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以自然权利为出发点强调个体之间平等的权利,强调个体的占有性权利。

第三部分我想接着上述第三个阶段的讲法来讨论单有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所带来的困境。在一个传统的社会,或者在上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个人作为集体成员的角色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时就是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维度压倒了成员的面向。贝克的《个性化》对这一点阐述得非常清楚,它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如何塑造核心家庭作为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单位,又如何推动自然权利学说,鼓动女性接受教育、参与工作,从而做大劳动力的蓄水池。这样就会产生若干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平等的问题,今天上午马冬玲老师讲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研究的时候,就呈现了这个困境。我们该忽视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实现男女完全的同工同酬来推进绝对的性别平等,还是顾及生物学意义上差别的平等呢?如果是顾及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的平等,那么是根据性别差别来确定男性和女性各自的职业和岗位,还是职业上不分性别和差别,但在评价标准上应该顾及性别的差别?这些问题我相信没有终极的答案,甚至在现实中要回答到让所有女性满意也很困难。

第二个困难就是如果把家带进来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在一个晚期现代化的社会中,在一个制度化的个体化发展到极致的社会中,协商性家庭可能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家庭构成模式,也就是说具有充分

理性的男女双方基于各自的理性考量,通过协商形成家庭或者抛弃家庭。虽然贝克说在这个背景下每个个体都要有一种利他主义,但实际上这种利他主义还是基于个体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提出的,所以家庭就会变成纯粹的利益的连接。但家是不是可以说抛弃就抛弃?人是不是只有权利和利益诉求而不再是情感的动物、渴望依赖的动物?这一点对于人性具有普遍性,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为突出。

进一步看,当家变成协商性家庭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社会蜕变为一种独立个体之间基于各种各样的功利性诉求或者自然权利诉求的时分时合,其秩序性和稳定性何以寻求?我们能不能面对这种纯粹的“抽象社会”?这些都是我们在个人主义背景下需要考虑的话题,尤其是中国人必须回答的话题,因为就如上午刘亚秋老师和马冬玲老师讨论的,即中国人渴望“安其位,遂其身”,这一目标似乎不分男女。而直接的和纯粹的平等学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进入我要讲的第四部分,讨论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公道”概念。

20世纪20年代,当平等学说或者男女平权学说引入中国,在各个领域得到积极响应的时候,潘先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分别于1928年和1931年发表了两篇批判平等观的文章,第一篇为《平等驳议》,第二篇介绍蒲氏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平等驳议》中,他对九种平等观做了系统性批判,其中就批判了女权运动中间的男女平等观。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对男女平等观念的批判。这两篇文章都否定了自然平等以及这个基础上的各种平等表达,认为这些学说是在生物学和社会学尚不发达的背景下的产物,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反而无端引来了各种麻烦。

基于此,他根据中国人常说的“公道自在人心”提出用公道说来代替平等说。公道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科学的标准,“通常一个人的发育机会、作用、享用,若是可以和他的天赋的能力相副,不过度亦非不及……这就是公道”<sup>[22]PP152-153</sup>。其基础是天赋说。另一个标准是从社会的角度说的。“社会进化,社群生活日繁,初则形成若干浮动之舆论,乃其固定,乃成所谓‘社会良心’者,举凡事物之利弊,人我之是非,莫不以‘社会良心’为准绳而定进止取舍与褒

贬焉。”<sup>[22]P74</sup> 具体言之,“人人认定人类多形之现象,各视其性质与程度之不同而异其权利与义务之支配,达荀子所称‘人载其事,各得其宜’之至理,则疏乎其可矣”<sup>[22]P75</sup>。实际上也是今天上午刘亚秋老师和马冬玲老师提到的“安所遂生”概念。

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说,公道说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标准,就是天赋标准。潘先生认为,男女有天赋的不同,品性皆有不同,功用岂能一致?潘先生这样说,倒不是要否定男女平权学说,而是主张重新认定人类不同活动的意义。具体而言,潘先生反对妇女运动将创造家庭和产生子女当成低人一等活动的观点,而是认为若以男子为创造文化、产生财富的人,女子便是创造文化的人,是产生财富的人。换言之,潘先生把家庭作为社会继替的功能,将其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家庭是社会与种族治安与演进的保障。这样,潘先生就把性别关系拉回到我前面所说的第二个阶段。

在介绍潘先生的公道说之后,我想进入第五部分,谈谈他的公道说对于性别研究的可能启发。

首先,我认为,潘先生的公道说在今天看来存在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他从现实主义角度来否定平等学说的可行性,尤其是否定自然权利和人格平等学说,其实是将理论与现实混为一谈,用现实可行性与否来否定理论和理想的必要性。今天,自然权利学说不管是否可以操作,都已经是现代社会的立论基础,缺失这一点,现代社会就难以为继。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的任何题目,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性别研究当然同样如此。第二,他强调以天赋作为公道之标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但他在这里面犯了一个错,即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他们作为整体的天赋和职业,所以他就会认为家庭应该是女性的工作空间,而家庭之外由男性来做工作。由此,他就从天赋及科学角度将女性这个群体锁定在社会的位置上,也就犯了天赋决定论的毛病,罔顾具体个体的差异。

除此之外,公道说对于研究性别问题是有很多启示的。我们看公道这个词。公道是个非常社会学的概念,强调的是人在不同需求之间,不同情景之间的“位育”,即《中庸》中所说的“中和位育”。而且,

这样一种学说不仅仅是中国,实际上在古希腊的传统中也有详细阐述,甚至其阐述要比儒家的传统高明得多、细致得多。

具体而言,这样一种公道对于我们研究性别,可能会有以下五点意义。

第一,从认识论角度说,对于性别的中国研究,不能只放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来展开,也不能只顾理念而轻忽经验,反之亦然,更需要将它视为一个中外古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议题。这正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的视野。

第二,接续第一点的论述,特别要有历史的视角,要去分析我们对性别关系的认知、价值判断以及实践是怎样在历史脉络中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有其判断“公道”的公认的“社会良心”,以及这些“社会良心”的变迁。

第三,研究性别关系,可能最绕不开的议题就是“家”。这里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除了其功能性存在(如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功能外,这些功能似乎都是可以替代的),是否具有一种更为本体性的价值,或者说人是否需要这种本体性价值,即爱、相互的依恋。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性别关系研究就必须首先以家的研究为基础,需要考察亲情、爱情的本体性与个体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内在关系,从考察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家庭成员的人的内在关系出发来探讨公道之可能性。

第四,公道说还要求性别研究从性别之间的换位思考出发来展开。男性和女性是相互依存的,即使是同性恋,也不可能排除同异性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将性别研究置于具体情境如家庭、工作岗位中,通过性别换位思考,来寻求性别之间“公道”的可能路径。

第五,公道说否定了除“自然权利”和人格平等这一基础性预设之外的抽象论述的意义,认为这会陷入各种无谓的争论,而主张一定要在具体情境中来研究性别关系,如具体的夫妻关系、家庭中,以及具体的就业体系中,譬如某个部门的性别平等、不同单位之间的性别关系,或者同一单位内部不同岗位之间的性别关系。

总之,公道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性别关系调整

的目标,也可以被理解为性别研究的方法论。从目标上看,它将抽象的自然权利和人格平等同具体的性别关系实践联系了起来;从方法上看,它主张从性

别角度进入个体生活 and 实践所必须面对的各种不同具体价值、需求、情境,在它们之间动态地寻找尽可能合适的结合点。

### [参考文献]

- [1]DiPrete ,T. A. and Buchmann ,C.. The Rise of Women: The Growing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n Schools [Z].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3.
- [2]Yeung ,W. J. J..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45(4) .
- [3]Cotter ,D. ,Hermsen J. M. & Vanneman ,R.. The End of the Gender Revolution? Gender Role Attitudes from 1977 to 2008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117(1) .
- [4]Esteve ,A. ,Schwartz ,C. R. ,Van Bavel ,J. ,Permanyer ,J. ,Klesment ,M. and Garcia ,J.. The End of Hypergamy: Global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6 42(4) .
- [5]Qian ,Y.. Gender Asymmetry in Educational and Income Assortative Marriage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7 79(2) .
- [6]Van Bavel ,J. ,Schwartz ,C. R. ,and Esteve ,A.. The Reversal of the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Family Lif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8 44(1) .
- [7]Cherlin ,A. J.. 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2000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 2010 72(3) .
- [8]Qian ,Y. & Qian ,Z.. Work ,Family and Gendered Happiness among Married People in Urban China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2015 121(1) .
- [9]Qian ,Y. & Li ,J.. Separating Spheres: Cohor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ttitudes about Work and Family in China [J]. *China Review* , 2020 20(2) .
- [10]杨可.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 (2) .
- [11]Guilmoto ,C. Z.. Skewed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Futur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and India 2005–2100 [J]. *Demography* 2012 49(1) .
- [12]Jones ,G. W.. Delayed Marriage and very 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33(3) .
- [13]Hohmann-Marriott ,B. E.. Shared Beliefs and the Union Stability of Married and Cohabiting Coupl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 68(4) .
- [14]Keizer ,R. & Komter ,A.. Are “Equals” Happier than “Less Equals”? A Couple Analysis of Similarity and Well-Being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77(4) .
- [15]Qian ,Y. and Sayer ,L. C..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Ideolog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ast Asi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6 78(2) .
- [16]Goldscheider ,F. ,Bernhardt ,E. ,and Lappegård ,T..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41(2) .
- [17]Frejka ,T. ,Jones ,G. W. ,& Sardon ,J. P.. East Asian Childbearing Patterns and Policy Development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36(3) .
- [18]Jin ,Y. ,Manning ,K. E. ,& Chu ,L.. Rethinking the “Iron Girls”: Gender and Labou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J]. *Gender & History* 2006 18(3) .
- [19]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 J..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5 41(1) .
- [20]吴小英.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
- [21]闵冬潮. Gender( 社会性别) 在中国的旅行片段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5 (3) .
- [22]潘光旦. 人文史观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4.